

论儿童道德教育的底线

刘晓东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道德为本位的社会,鲁迅发现这种崇尚“道德”的社会却在“吃人”,以至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道德教育理论中一切以儿童为工具的那些漂亮口号是有待检视的。避免破坏儿童的生活应当成为儿童道德教育的底线。在以人为本的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教育理应以儿童为本位。建设以儿童为本位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重任之一。

关键词:儿童;儿童生活;道德教育

一、传统道德教育与现代道德教育的冲突

现代教育观念是以现代儿童观的建立为前提的。现代儿童观最根本的观念是:儿童不是小大人,儿童有独立的不同于成人的生活;童年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他在每一个年龄阶段都具有不同于其它阶段的生活,有所处年龄阶段相应的世界;儿童要完成他所处年龄阶段的发展任务,试图让儿童滞留于某一阶段或试图跨越某一阶段都是错误的。然而,传统的儿童观是瞧不起儿童的,因而传统的道德教育便是理直气壮地对儿童进行道德灌输,把成人世界的道德观念传输给儿童。

但在那些伟大学者眼里,儿童不再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头,他们是思想者和哲学家;在道德领域,儿童则是小小的道德哲学家。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可谓20世纪儿童道德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学者,也把儿童当作哲学家,并把这一观念作为其整个理论的出发点:“儿童或青少年是天生的哲学家,因此喜欢哲学上富有挑战性且较高明的问题和叙述..此一假定即是激起在教室中采用假设的道德两难困境进行教学,以及在多次教师研习会中,研习认知发展论道德教育的原动力。”^[1]科尔伯格在道德教育方面主张对话讨论的形式,试图帮助儿童生成自己的道德认识。这种主张就是建立在儿童就是哲学家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上的。道德灌输的德育方法与科尔伯格的主张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格格不入其实就是传统道德教育与现代道德教育的冲突。

二、道德教育的底线:避免破坏儿童的生活

在某些国人看来,中国“开化最早”,“文明第一”,是“礼仪之邦”,所以应当早早地进行道德“教育”(其实是“灌输”),以便让中国保持道德文明的优势,把西方远远落在我们后面。然而,也有中国人——古人和今人都有——反对早早地对儿童进行道德灌输。宋代《五灯会元》卷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禅师,收养了一名儿童,老禅师从不教他礼仪规矩。一天有个行脚僧来寺中寄宿,发现这孩子竟然不懂逢迎寒暄迎送进退,于是在老禅师不在的时候,将礼仪规矩传给这孩子。老禅师回家后,发现了问题:这孩子怎么突然生出那么多繁琐的礼节。老禅师一问方知是位云游的和尚好为人师,于是非常生气,对那位行脚僧下了逐客令:“我收养这个童子已经两三年了,怪可爱的,谁让你教坏他?赶快收拾东西走吧!”当时正是风雨交加,电闪雷鸣,这位云游的和尚只好灰溜溜地消失在风雨中了。^{[2][338]}由此看来,这位老禅师是十分喜爱童心的人,他认为那些体现宗法等级名分的礼仪规矩全是障蔽“童心”的,把这一套传给儿童,只能教孩子学坏。

去今不远的丰子恺也有类似的主张。丰子恺反对过早对儿童进行所谓种种规矩的灌输:“小

孩子长大起来,涉世渐深,现实渐渐暴露,儿时所见的美丽的世界渐渐破产,这是可悲哀的事。”“此后的生活,便是挣扎到死。”“世间教育儿童的人,父母、先生,切不可斥儿童的痴呆,切不可盼望儿童的像大人,切不可把儿童大人化,宁可保留、培养他们的一点痴呆,直到成人以后。”“这痴呆就是童心。童心,在成人就是一种‘趣味’。培养童心,就是涵养趣味。”“一般的父母、先生,总之,是以教孩子做大人为唯一的教育方针的,这便是大错。我尝见有一个先生对七八岁的小孩子讲礼貌、起立、鞠躬、脱帽、缓步、低声、恭敬、谦虚..这些都是从小摧残他的童心。”^[2]²⁰⁰丰子恺认为,礼貌等等原非恶事,然而“在人的广泛伟大的生命上看来,是最末梢的小事而已”。“孩提的时候教他,专心于这种末梢的小事,便是从小压倒他,叫他望下,叫他走小路。这是何等的教育?”^[3]可见,丰子恺也是出于爱惜儿童、尊崇童心、珍爱童年的生活,而反对把成人看重的所谓“道德”、“规矩”灌输给儿童的。

周作人晚年回顾早年的儿童文学活动和论述的主要事项时,又强调了他早期提出的儿童观思想。他概括出的两点是:第一,“承认儿童有独立的生活”;第二,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他还特别强调:“我这样的说,仿佛是什么新发现似的,其实是‘古已有之’的话,在一千几百年前印度的《大智度论》里已经说过类似的话。”这些话是:“..众生所著皆是虚诞无实。譬如人有一子,喜在不净中戏,聚土为谷,以草木为鸟兽,而生爱著,人有夺者,瞋悲啼哭,其父知己,此子今虽爱著,此事亦离耳,小大自休,何以故?此物非真故。”周作人赞曰:“印度哲人真是了不起,‘小大自休’一语有多少斤两,说明儿童的特质..”^[4]

这“小大自休”就是周作人所谓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正因为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所以我们应当尊重儿童的世界、儿童的生活,并“放胆供给”(周作人格外强调要“放胆供给”)儿童的世界所急需的精神食粮。说到周作人的“放胆供给”,便让我想到了一个外国人,他就是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 -1970)。罗素是反战的,但他曾容忍自己年幼的儿子玩蓝胡子杀妻的野蛮游戏,他认为这种野蛮游戏恰恰有助于儿童最终脱离野蛮。罗素曾报告他儿子曾有过这样一件轶事。罗素的妻子有次给年幼的儿子讲蓝胡子(法国民间故事中连续杀掉6个妻子的恶人)的故事以后,儿子在游戏中坚持选择扮成蓝胡子,并认为蓝胡子的妻子不服从命令,杀死她们是应得的惩罚。在游戏中他甚至表演出把女子的头颅血淋淋砍下的恐怖情景。也许有人会质问罗素:作为一个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你怎么可以允许幼稚的儿子有杀人的念头而津津乐道呢?面对这一问题,罗素坦然地认为:“教育主要在于本能的培养,而不是压抑本能。”^[5]在孩提时代通过装扮蓝胡子可以大致地满足一下他的权力支配欲。如果成人把他的权力支配欲在儿童时期就消灭于萌芽状态,他就会心灰意冷、暮气沉沉,不做好事也不伤害他人;这种不做好事也不做好事的懦夫不是世界需要的人,也不是我们要努力培养的孩子。在儿童年龄尚小不足以造成破坏时,应当顺应他自然的天性,任其在梦想的王国里过着远古野蛮祖先的生活。不要害怕孩子将总是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因为你会给他提供获得更多高尚的满足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其实,儿童本人亦有追求更为高级更为高尚的生活的本能。罗素声称:“我是个小孩子时,特别喜欢翻跟斗。但是现在我从不翻了,尽管我认为这么做没有什么邪恶之处。同样的,喜欢扮演蓝胡子的孩子也将会改变口味,而学习以其他方式寻求权力。”^[5]可见,罗素也主张“放胆供给”,不只是宽容小孩子的生活,而且是尊重小孩子的本能、小孩子的世界。他并不怕小孩子因此而变坏。我想,罗素也会认同印度古哲人“小大自休”的说法的。印度古哲人“小大自休”的说法与中国民谚“树大自然直”应当有共同之处。小孩子的生命不会像我们这些成人那样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退,他们的生命是“转变的”、“生长的”,他们的这种“转变的”、“生长的”童年生活,是生命进化历史赐予人类每个个体的礼物。我们应当珍视这种礼物,珍视小孩子的童年生活,而不是用读经这样的教育生活破坏他的那种好奇的、探索的、游戏的、艺术的、幻想的、涂鸦的、歌唱的、蹦蹦跳跳的那种生活。经书中的文言文、生僻的字词和道德说教等等大道理,离幼儿的生活距离遥远,

不当让他们侵入幼儿的生命、幼儿的生活、幼儿的世界。当小孩子的理性和智慧成熟到能够接触、理解、评论这些经书的时候,我们再来创造条件让他们尽情尽兴地学习、阅读、评论这些经书,而他们是否接受、接受多少、如何评价这些经书,则完全由他们的头脑来决定,是成人不宜强迫的。

“天地之大德曰生。”当道德教育是以破坏儿童的生活、破坏儿童的成长为代价时,道德教育便走向了它的反面,道德教育本身便“不道德”了。所以,为了使道德教育避免“异化”为“不道德”的教育,我们就应当为道德教育设定底线,设定前提。道德教育应当以不破坏儿童的生活为底线。道德教育应当以尊重儿童的生活为前提。

三、呼唤儿童本位的道德教育

按照蒙台梭利的说法,儿童早期的心理具有吸收性的能力,它不断自发地按照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尺度、自己的机制将周围环境中的一切信息筛选、加工、固结于自己的心理世界,从而实现心灵的成长。她认为儿童早期所具有的这一智慧并非人为的,而是自然赋予的。“儿童的意志与自然的意志是一致的,儿童在一条一条地遵循自然的规律。”^{[6]405}儿童的有吸收力的心理是自然的造化,是自然的智慧在儿童身上的体现。蒙台梭利向往着将这一智慧永远保持在人身上:“如果我们能够随时随地聪明地对待儿童,理解其最迫切的需要从而延长儿童这个具有吸收能力的时期那该有多好呀!”^{[6]346}“如果我们能够保留我们在儿童时所具有的那种奇妙的能力该有多好啊!那时我们总是快乐地嬉闹玩耍,又蹦又跳,同时不知不觉中学会了那些人之为人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东西。”^{[6]344}正是因为儿童那里发现了神奇的智慧,正是因为发现了儿童在不断地创造着成人难以做到的奇迹,蒙台梭利才如此地尊重儿童,如此地推崇儿童。也正因为如此,她告诫教师和全体成人:“Follow the child(可译为‘向儿童学习’或‘跟从儿童’)。”幼儿园之父福禄培尔也曾经表白:“我就像一个诚惶诚恐的学生一样向小孩子学习。”事实上,现代儿童教育的立场和观念的诞生便是以“发现儿童”为前提、为起点、为标志的,随着对儿童的不断发现,儿童教育理论相应地不断发展。现代教育理论的内核——借用蒙台梭利的话——其实就是

“Follow the child”。杜威提出的儿童中心主义是如此,风靡于世界并曾经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幼教界激起热浪的瑞吉欧教育也是如此。而在瑞吉欧的热浪下面,“幼儿读经”却在中国如火如荼。这就说明,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立场还没能真正在中国扎根。还有不少人赋予“幼儿读经”弘扬传统文化的伟大使命,赋予“幼儿读经”对抗西方文化“侵略”或文化“殖民”的伟大使命。

有这样一种观点:“现代的许多学生非常缺乏古文阅读的能力,这势必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而从幼儿起就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这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是一件于国家、民族功德无量的事情。”我想,许多人可能有类似的紧迫感。但是,由于“现代的许多学生非常缺乏古文阅读的能力”,而试图以“幼儿读经”的方式来恶补的解决方法却是错误的。幼儿是民族的未来,让幼儿恶补“读经”,非但不是“一件于国家、民族功德无量的事情”,恰恰会破坏幼儿成长的时机,恰恰会让民族生命、民族文化从根基开始腐烂。我相信,这是那些“恶补派”所不愿看到的。

中国是一个泛道德的社会,是以道德为本位的社会。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等人发现:这种泛道德的礼教社会、以道德为本位的社会,却在吃人,吃小孩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礼教与人的本性是作对的。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是打着存天灭人的口号,灭人的身心中的天。灭天——“逆天行事”(鲁迅语)——发展到让女童裹足、缠裹天足至于畸形。灭天让人的心理如女人的小脚那样残废,那就是用所谓圣贤的话作为常理常道缠裹心灵。^[7]中国的传统中确实存在这种文化,甚至现在依然大有余续。儿童读经运动其实就是一场用裹脚布来裹头的运动。不过中国从古至今相反的呼声一直都在。从《学记》的“禁于未发”^[8]到鲁迅《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以及《今天我们怎样做父亲》的追问与呐喊。所有这些主张都是以儿童为本位,而不是

文化为本位、道德为本位、民族为本位。一切以儿童为工具而不是以儿童为本位为目的的漂亮口号,都是有待检视的。

中国的儿童教育需要儿童本位,中国的文化建设也需要儿童本位。这让我想到了明代的一位学者罗汝芳。罗汝芳的《孝经宗旨》云:“道之为道,不从天降,不从地出,切近易见,则赤子下胎之初啞啼一声是也。听着此一声啼,何等迫切;想着此一声啼,多少意味!其时母子骨肉之情,毫发也似分离不开,顷刻也似安歇不过,真是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而直见乎天地之心,亦真是推之四海皆准,垂之万世无朝夕。舍此不着力理会而言学者焉,是谓远人以为道,纵是甚样聪明,甚样博洽,甚样精透,却总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用力虽勤,而推充不去。不止推充不去,即身心亦受用不来。求其如是而已,如是而人,如是而家、国、天下,如是而百年千载,我可以时时服习,人可以时时公共,而云学不厌、教不倦也,亦难矣哉!《经》曰:此之谓要道。”对上面这段话值得多做一些评论。罗汝芳将赤子之心、儿童天性看作身心的源头,也看作家国天下的源头,他是要建设童心为本的学说,是要建设儿童本位的社会与文化。这对于当今建设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我看来,建设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其重要任务之一便是道德概念和道德教育概念的变革和转型,将儿童本位作为中国儿童教育的基本德性,同时建设以儿童为本位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 [1] 科尔伯格. 科尔伯格序[M] // HERSH, R H. 道德发展与教学. 单经文, 等, 译.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9: 3.
- [2] 普济辑. 五灯会元[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3] 丰子恺. 关于儿童教育[M] // 丰子恺文集: 艺术卷二.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0: 255
- [4] 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M]. 香港: 三育图书有限公司, 1980: 400.
- [5] 罗素. 论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M] // 幸福之路. 欧阳梦云, 等,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 559.
- [6] 蒙台梭利: 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科学方法[M]. 任代文,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 [7] 刘晓东. 从三寸金莲到儿童教育[C] // 解放儿童.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175-183.
- [8] 刘晓东. 先秦《学记》“禁于未发”章新诠[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2): 74.

On Bottom Line for Moral Education among Children

LIU Xiaodong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used to be a moral-based one, in which Mr. Lu Xun had, however, detected the essence of “cannibalism” and called for “saving the kids”. This indicates that all

those high-sounding guidelines observed in the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theories, characterized by instrumentalism, are yet to be re-examined for legitimacy today, and that avoiding interference in children's life should be the bottom line for their moral education. In such a humanistic society as China today, the moral education among kids should be, out of question, centered on the latter as equal and dignified subjects. It is also one of the missions of China's educational reform to set up a children-centered framework of theories for moral education among kids.

Key words: children; children's life; moral education

收稿日期:2009-10-12

作者简介:刘晓东(1966 -),男,江苏丰县人,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8年度教育学类一般课题“儿童观:文化传统的省思与现代化改造”(BAA080015)